一九八六年清代漠西蒙古历史研究综述

马 大 正

清代的漠西蒙古，亦称厄鲁特蒙古或卫拉特蒙古，是清代前期历史舞台上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在青藏高原、天山南北、大漠上下谱写了多采的史章。它们的历史活动日益为我国学者、特别是清史、蒙古史、中亚史学者所重视，近些年来研究成果瞩目，据笔者所见，1986年发表了有关本研究领域的著作1部、资料10部（篇），论文38篇、译文4篇，研究综述和书评5篇。现综述如次。

一

专题研究中，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仍是研究者致力的一个热门课题。

和硕特部顾实汗进军青藏高原是明末清初蒙藏关系，乃至我国民族关系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的事件。罗丽达《明末清初的蒙藏关系和顾实汗入藏事件》（《清史研究集》第五辑）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对顾实汗入藏的原因、进程及深远影响作了较详尽论述，指出：1642年顾实汗率军进藏，“以武力确立了西藏黄教在蒙藏社会的独占地位，造成蒙藏两大民族在宗教信仰上的统一。这一事件的结果，不但进一步密切了蒙藏之间的联系，也成为后来清政府‘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这一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的历史前提，对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积极影响”。文章分析了顾实汗在西藏施行的一系列政策后认为：“顾实汗入藏后，除了必要的军事行动以外，没有更多地使用暴力，没有用大规模野蛮的屠杀对付藏族人民，以至把游牧的，落后的生活方式强加给西藏社会，这固然归结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个戎马生涯、兵力强盛的蒙古汗王来说，能做到这一步是难能可贵的。他入藏不久，即结果了西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分裂、动乱的局面，造成了一个时期内西藏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对西藏社会发展是有进步作用的”。应该说，作者分析历史事件的视点是有新意的。唐明英《第巴桑结嘉措对和硕特汗王的斗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3期）在叙述了17世纪下半叶这一西藏政坛上重大事件后指出：“桑结嘉措为了赶走和硕特汗王以己身亡告终，可他在与和硕特汗王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智是令人钦佩的。他们之间相斗争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它揭开了清代前期西藏地方由蒙藏联合掌权的政治体制向藏族统治者掌权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过渡所不可避免的斗争序幕”。

康熙二十九年的乌兰布通之战，是康熙帝三征噶尔丹之肇始，邢玉林《乌兰布通之战》（《民族研究》4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自己的笔触深入到这次冲突的经济原因，文章不以战争胜败论英雄，指出：清政府实施经济、政治两位一体的措施，为迫使噶尔丹退出喀尔喀地区，绝噶尔丹进贡、贸易之路，置噶尔丹于绝境，使噶尔丹只能背水一战，用战争手段扫除经济上障碍。清政府这些政策上失误，“反映出清政府在处理民族关系中的阶级的和民

族的偏见”。作者的分析于开拓研究者的思路无疑是有益的。张羽新《乌兰布通之战的胜败问题》(《历史研究》5期)通过对有关乌兰布通之战战况报告的考释，指出：“在这次激战中，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清军并未击溃噶尔丹军队。噶尔丹的战后请和，只是一种退兵之策，并非‘卑词乞降’。其军队的大量减员，亦非遭受清军杀伤的结果，而是瘟疫造成的。在战斗过程中，由于清军腐败，造成了许多失误并遭受重创，因此，把乌兰布通之战说成是清军大败噶尔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策妄阿拉布坦统治时期是准噶尔历史上重要时期，江波《论策妄阿拉布坦时期准噶尔的兴盛》(《西北史地》4期)在对比分析了策妄阿拉布坦与噶尔丹的不同特点后，认为：“经济上的繁荣需要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密切配合，而这些方面的成败又依赖于经济的强弱。正是这几种因素的相互影响，才构成了策妄阿拉布坦时期的兴盛局面，而破坏了任何一点，都会损害这种平衡，导致衰落甚至失败。由于策妄阿拉布坦的领导，使准噶尔人民从噶尔丹时期的灾难中解救出来，并且走向了噶尔丹策零时期更大的繁荣。所以说，他不愧为准噶尔人民的出类拔萃的领袖”。

噶尔丹策零时期准噶尔与清朝为划定游牧界，进行了复杂的政治谈判，张羽新《阿克敦伊犁之行述评》(《新疆社会科学》2期)对作为清政府特使，二次赴准噶尔进行议和谈判的阿克敦的活动，从谈判背景、始末等方面作了述评，认为：“阿克敦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两次前往伊犁，与喀尔喀议和，使准噶尔与清中央政府暂时停止了近半个世纪的兵戈相向，出现了二十年的和平相处局面，这无论从新疆经济的发展或从清朝彻底统一新疆的角度来说，都是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指出此次划界的性质“根本不是什么划分‘疆界’，而只是划定了准噶尔与喀尔喀之间的游牧界，作为避免双方武装冲突的一种措施”。

乾隆时对准噶尔二次用兵的功过，研究者是有争论的。左书谔《乾隆区别对待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的原因》(《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期)从具体分析他们二人的政治能量入手，认为乾隆之所以区别对待，是由“他们对清朝中央政权威胁作用的大小不同、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的阻力大小不一”而决定的。王希隆《平准战争中的转输与屯田》(《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期)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了清朝在对准噶尔部屡次战争中是如何解决军队的后勤支援问题。文章在指出“康熙五十四年以前，平准清军的粮草依靠转输供给；康熙五十四年开始，则以屯田和转输并行供给”后，重点分析了北路屯田(主要在喀尔喀蒙古西部)和西路屯田(主要在新疆东部巴里坤、吐鲁番、哈密、甘肃河西地区)的兴起和作用，指出：屯田虽是为“裕军需、省转输”而办，但在客观上却大大有利于屯垦地区经济的发展。

对土尔扈特部历史的研究有三篇论文值得一读，诺尔布《试论土尔扈特的起源》(《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1)》(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依据托忒文资料和有关中外史载，认为土尔扈特起源于克列特(亦即《辽史》上的北阻卜)，直到与成吉思汗同时代的王罕(王汗)时，克列特开始改称为土尔扈特，马汝珩、马大正《略论十八世纪二十—五十年代的土尔扈特汗国》(《新疆社会科学》6期)一文利用了清朝与俄国档案文献和有关史载，对1724—1761年期间，亦即阿玉奇汗逝世后土尔扈特汗国的政治局势作了分析，指出：这一时期“由于王公贵族内部为争夺汗位继承而造成汗国内乱频仍与汗位不断更迭，是汗国由兴盛转向衰落的动乱时期”，“而强邻俄国对汗国控制的加强，也正是因汗国动乱才得以乘虚而入”。杨永宽《歌颂祖国团结统一的画卷——〈土尔扈特部归顺图〉介绍》(《北方文物》

2期)对这幅原是清宫藏品，后被溥仪带到东北，日本投降时流散于民间直到1982年才入藏辽宁省朝阳市博物馆的珍贵画卷作了介绍。

对漠西蒙古的经济和宗教研究方面，叶志如《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新疆大学学报》1期)通过对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关汉文档案的研究，将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贸易熬茶活动的政策归结为下述几项：1.柔远之中寓驾驭绥抚及无滥无苛的政策，2.特使的亏商补贴和官商经办政策，3.对准部贡使及商人的病治和抚恤政策，4.对于熬茶布施活动的照顾和特使的优待政策，这些政策的核心是“以怀柔为手段，借以笼络准噶尔部的上层，以达到统治准噶尔人民的目的。但就其效果来说，它不仅使准噶尔部恭顺于清王朝的统治，达到‘海宇共享升平之福’的目的，有利于维护封建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团结。而且在客观上，使准噶尔部人民和内地各族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和发展；对于促进新疆和内地的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上)(中)(下)(《新疆大学学报》3期、4期、1987年1期)同样依据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论述了清朝与准噶尔贸易活动的一个重要窗口——肃州(今甘肃酒泉)贸易的始末、历年贸易数额、准噶尔与内地货物的互输等问题。陈柏萍《清朝前期青海蒙藏民族和中原的贸易关系》(《青海民族研究》第三辑)分析了1642—1677年间为和硕特蒙古所独占的青海蒙藏民族与中原之间贸易演变、发展进程，以及“朝贡”、“官市”，“民市”三种形式不同而又互相联系的贸易形式。巴赫《准噶尔地区的黄教及其寺院研究》(《新疆历史研究》1期)根据作者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记载，对新疆的黄教寺院的概况、寺院僧侣组织，黄教僧人的学位及其经典作了介绍，并进而分析了黄教在漠西蒙古的传播、清朝扶持黄教的政策，以及黄教对于漠西蒙古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指出：清朝统治阶级“以黄教来驾驭蒙古人，是以整个民族为目标的。黄教也以其特殊的社会功能，使准噶尔地区的蒙古民族最终堕入了委靡不振的毁灭性深渊”。

二

从地方史角度对分居各地的漠西蒙古进行研究和托忒文资料整理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今天漠西蒙古主要聚居地区新疆的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的概况相继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属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为我们提供了简明的教材。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编写的《巩乃斯乡调查资料集》(《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4辑)为我们了解土尔扈特聚居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巩乃斯乡的宗教社会情况提供了典型的调查资料。1985年夏天进行的这次调查是继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新疆大学历史系等单位联合组织的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宗教考察(有关情况可参见马大正、蔡家艺《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考察纪略》载《光明日报》1983年1月12日)之后的一次定点调查。这次调查中发现了托忒文的昂嘉喇嘛传。昂嘉喇嘛是土尔扈特蒙古最古老喇嘛之一。1771年渥巴锡率部东归后，昂嘉庙即设在巩乃斯乡。在东返斗争中起过重大作用的罗卜藏扎尔桑喇嘛(又详作洛桑丹增)即是第七世昂嘉嘛嘛。苏北海《新疆北路土尔扈特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新疆历史研究》2期)是作者1983年对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进

行调查的调查报告，为研究者提供了有关社会组织、寺庙状况，以及关于策伯克多尔济民间传说的资料。

活动在青海的河南蒙古亲王是清代和硕特蒙古中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张庆有《黄河南蒙古亲王岱青和硕齐与一世章嘉木样结盟考略》(《甘肃民族研究》1期)论述了岱青和硕齐(即察罕丹津)的政教活动及其与拉卜楞寺的关系，勾画了康熙末年、雍正初年发生在青海高原的蒙、满、藏关系的复杂局面。樊保良《论拉卜楞寺在历史上的作用》(《西北史地》3期)则探讨了拉卜楞寺在促进清代以来蒙藏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上的积极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额济纳旗居住着和硕特、土尔扈特的后裔。陈育宁选编《阿拉善史志资料选编》(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出版)收集了清代以来有关文献和调查材料，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朝格图、白晓《阿拉善、额济纳旗历史由来》，巴达尔胡《古居延与额济纳土尔扈特之来历》(均载《阿拉善盟文史》第一辑)对清代以来的历史沿革作了较详尽介绍。

对今天生活在国外的漠西蒙古情况，国内知者甚少，美籍土尔扈特裔学者迪瓦女士用汉文撰写的《居美之卡尔梅克人》(《西北史地》2期)弥补了这方面不足，该文介绍了本世纪以来漠西蒙古后裔迁移美国概况和生活、宗教信仰现状，指出：居美的漠西蒙古后裔“已变成了美国大民族中的一员。以往的民族感情已逐渐被一种新的因素替代，这是可悲的，但平心论这又是自然的、必然的”。

在托忒文文献整理方面，诺尔布、冯锡时《托忒文历史文献的汉译注释》(《新疆大学学报》2期)根据近年对九种托忒文文献整理汉译注释的实践，认为：托忒文历史文献的汉译注释必须以托忒文文献本身的整理研究为前提，因此要广泛收集各种托忒文文献的版本，要组织力量进行版本校勘，注释要包括二方面内容，一是文字训诂、一是史实考订，唯此才能将托忒文文献的整理纳入科学的轨道。金峰《对我国托忒蒙文文献研究的展望》(《蒙古学资料与情报》3期)则对我国蒙古族学者进行的托忒文文献整理工作作了介绍。

在对托忒文文献进行介绍方面，郭蕴华《清代厄鲁特蒙古的一份‘祭地书’》(《新疆社会科学》6期)介绍了准噶尔达什达瓦部离开伊犁故地时一份祭祀家乡山河的祭文，指出这份祭地书“是研究清代前期厄鲁特蒙古活动地域及研究我国疆域史的一份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巴赫：《德迪〈蒙古根源史〉》(《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期)介绍了这本鲜为人知的手抄本托忒文资料。

三

在1986年漠西蒙古史研究中还有二种值得一书的成果。

其一是，杜荣坤、白翠琴《西蒙古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版)一书的出版，是近三年内第四本这一领域的专著。本书收集了作者专题论文18篇，其中有5篇涉及清代漠西蒙古史，《关于准噶尔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在具体研究了准噶尔重要历史人物活动后提出了三条评价标准“一、客观上是否有利于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二、是否有利于本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三、是否有利于对外来侵略势力的反抗和斗争”。《十五至十八世纪卫拉特社会组织和统治机构》分别论述了十五至十七世纪初瓦剌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十七世纪中期至十八世纪中期准噶尔社会集团和统治机构的组成及特点，认为：“一六四〇年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

典既是厄鲁特封建制度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封建制的巩固和发展”，到十八世纪前半叶“其社会组织、统治机构由简到繁，日臻完备”，较为系统地记述了准噶尔部的阶级关系、社会组织和统治机构，开拓了研究新领域。

其二是，8月10日至8月16日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的博乐市召开了卫拉特史学术讨论会。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出席会议的92名各民族代表，提交了38篇（部）论文，其中用蒙文撰写的有13篇（部）。会议着重讨论了卫拉特联盟、托忒文文献整理、卫拉特史研究概况，以及地方史研究中的卫拉特史等问题，（参阅阎丁《卫拉特史学术讨论会综述》民族研究》5期）。依我之见，这次会议的积极成果在于：第一，蒙、汉等族学者就感兴趣问题交流了意见，增进了彼此了解；第二，专业研究者与地方史工作者建立了联系，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都是今天促进漠西蒙古研究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综上所述，1986年漠西蒙古史研究有收获，特别是在地方史研究中有较大进展，但总的看突破性的成果尚不多见。据笔者所知，国内一些研究者正在致力于的研究，已完成或接近完成的有：《十七至十八世纪土尔扈特蒙古政治史略》、《卫拉特史入门》、《清代土尔扈特蒙古满文档案译辑》等专著与史料集，正在编撰中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辞典》中也为近200个漠西蒙古历史人物立了传，可以预计1987年的研究前景是乐观的。

（上接第46页）

刘坊撰《万季野先生行状》，称刘献廷“既归吴，未几身殁”可以为证。其次，关于刘献廷的卒年，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八《刘处士墓表》记得很清楚，为康熙三十四年。文中所记刘献廷于康熙二十九年后数年的行踪，也清晰可据：“庚午，复至吴，遂南游衡岳。因而归，方谋与同志结茅著书终老，乃不一年死矣”。王、刘为莫逆之交，又曾亲自过问刘献廷丧事，他的记载当然要远比后人全祖望追述往事所作的揣测可信。第三，《戴名世集》卷三《蔡瞻岷文集序》所云“偕隐旧京”，“旧京”之所指，并非北京，而是南京。退一步说，假定刘献廷于康熙三十四年有所谓“履约”事，只会是去南京，而断不至北上燕京。此外当初戴名世与刘献廷、王源、万斯同等在京中拟议的“偕隐洞庭”，“洞庭”之所指，也非如作者所说“洞庭湖”（本书36页），而是太湖洞庭山。

当然，本书存在的这些偶然疏失，同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相比，无非细枝末节而已。不过，由此似可悟出，智者千虑，难免一失。因此，在学术争鸣中，惟有展开积极争鸣，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始能一步步向真理接近。学如积薪，后来居上，固是不可移易的自然法则，但倘无前人的艰辛积累，继起者的后来居上是无从谈起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很赞成作者的一句话：“落实思树，饮流怀源”（本书《自序》）。如果说还需要作什么补充的话，我认为似可略加注释，即这句话不仅是指对老师谆谆教诲的铭记，而且也应该包括对先我而行的成功者以及失败者艰苦劳动的尊重。